

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化问题(笔谈)

[编者按]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历史进程,始终是学术界探索的焦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实践中愈发凸显。从人类历史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和特征?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推进剂和新的“增长极”在哪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世界历史解释的新视角,其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以上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特组织主题组稿会,聚焦相关话题,邀请学界专家深入讨论,相关成果陆续刊发。本期笔谈,汇聚王立新、仲伟民、原祖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农业社会转型等视角切入,共同勾勒现代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王立新教授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政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后发优势”》聚焦后发国家现代化路径,以日、德、中国为例,剖析“后发优势”的双刃剑效应。文章指出,技术引进、出口导向等策略的成功,既需国内发展战略的精准设计,更依赖和平的国际环境与技术合作的开放性。冷战后的全球化红利曾助力中国崛起,而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则警示: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可能使“后发优势”转为“后发劣势”。审慎处理国际关系、维护技术合作渠道,成为后发国家延续现代化动力的关键。仲伟民教授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以中国现代化实践为背景,系统探讨理论争议与现实启示。文章对比格中克龙的“后发优势论”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结合南非、伊朗等国的现代化案例,揭示后发国家在技术模仿与制度借鉴中虽能实现阶段性跨越,但若忽视制度创新与社会公平,可能陷入结构性矛盾。作者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利用,但城乡差距与创新瓶颈等问题凸显“后发劣势”的潜在威胁。平衡优势与劣势的关键在于制度优化与国际环境的动态适应,为后发国家提供警示与借鉴。原祖杰教授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以英美两国农业现代化为例》将视角投向现代化的“根基”。文章揭示,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技术革新与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是社会结构、生态平衡与政策干预的复杂博弈。英国圈地运动加速城镇化牺牲农民权益,美国通过政府调控平衡生产与生态却难掩农村凋敝。二者均警示:农业转型需统筹技术进步、制度公平与生态可持续,避免以“效率至上”遮蔽人文关怀与自然法则。三篇笔谈虽视角各异,却共同指向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矛盾——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效率与公平、技术理性与人文生态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既要善用“后发优势”突破技术瓶颈,又需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农业社会转型中生态与社会受到损害的覆辙;既要把握国际合作战略机遇,亦需警惕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刊期待此次笔谈能激发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多维对话,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为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关怀的现代化路径贡献智慧。

现代化进程与世界政治演进：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后发优势”

王立新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海淀 100871)

[摘要]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解析“后发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局限。以日本、德国等国的现代化历程为例, 后发国家能否实现技术跨越与经济腾飞, 不仅依赖国内发展战略, 更受制于国际环境的稳定性与技术合作的开放性。二战后的日本依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通过技术引进与出口导向战略迅速崛起, 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因外交失策导致现代化中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受益于冷战后的和平国际环境, 但当前中美关系紧张正在恶化这一环境。审慎处理国际关系与维护技术合作渠道, 是后发国家规避“后发劣势”、延续现代化动力的关键。

[关键词] 后发优势;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代化进程; 国际环境

[中图分类号] D50; F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5)02-0006-05

18 世纪后期, 英国率先开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此后, 现代化浪潮席卷各地, 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过程”,^[1] 各国都主动或被迫地卷入其中。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根据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把卷入这一进程的国家划分为“先(原)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firstcomers and latecom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英法美三国通常被认为是先发现代化国家, 三国现代化的启动发生在思想启蒙和民主革命之后, 其动力是内生的, 主要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完善市场机制和保障个人自由来激发创新和推进工业化。其现代化进程从启动到完成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包括 19 世纪晚期的德国、日本、俄国(苏联), 二战后的亚洲“四小龙”和冷战结束后的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无疑也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往往因为感受到先发国家的压力和挑战, 出于维护安全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因此这些国家进行的现代化也被称为“防御性现代化”。美国经济史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社会学家马里恩·列维(Marion J. Levy, Jr.)认为,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启动虽然较晚, 但具有“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或 latecomer's advantage), 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发优势, 后发国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工业化, 实现财富和国力的快速增长, 甚至可以超过先发国家, 实现“后来者居上”。^[2]

[收稿日期] 2024-12-25

[作者简介] 王立新(1966—), 男, 辽宁兴城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国际史。

现代化问题研究者所说的“后发优势”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引进和采用先发现代化国家发明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不需要漫长的技术积累和投入巨大的资源就可以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地缩短科技进步的时间。

二是吸引和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解决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初期资金匮乏的问题。

三是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巨大市场,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腾飞,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就是这种发展战略。

四是因为有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和激励并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效仿,后发国家可以奉行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通过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实施所谓的“赶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技术水平和工业实力上赶上先发国家。

简言之,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对先发国家技术、资金和市场的利用以及现代化模式的效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韩国学者张庆燮(Chang Kyung-Sup)把这一现象称为“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3]。

二战后的日本是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实现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典型。日本在二战结束时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苏联和英法等。但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到196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二大经济体。^{[4]37}在这一时期,日本以极低的成本大规模地引进了外国(主要是美国)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迅速提升了自身的科技水平,并在多个工业领域实现了对欧美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实际上,无论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日本的技术均主要源自国外,充分利用了后来者的“后发优势”。

不过,后来者的“后发优势”是潜在的、理论上的,能否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优势,或者说让这些可能的优势变为现实,还取决于诸多的条件,包括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正确的发展战略。事实上,并非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够充分发挥和运用“后发优势”,到目前为止,成功地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仍然是极少数。

更重要的是,“后发优势”能否被充分利用还依赖友好的国际环境,包括和平、稳定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有助于资金、技术、人员、信息和商品自由流动的世界经济秩序。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常常使一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功亏一篑。为什么国际环境会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后发优势”能否发挥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转让技术、提供资金和开放市场,以及后发国家能否持续地奉行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而此二者都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一旦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关系恶化,先发国家拒绝对后发国家转让技术和开放市场,甚至把后发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和敌人,那么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也就难以发挥。

在这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启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包括各国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变化之间的互动、世界经济活动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国际机制和环境如何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国家间财富分配,等等。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往往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实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前述的日本在二战后的成功与国际环境的友好密切相关。战后的世界虽然

陷入冷战之中,但日本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处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美日同盟关系确保了日本的安全,让日本无需将大量资源用于国防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为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推动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巴黎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作为制度框架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迅速增长,非常有助于日本从美国和欧洲获得先进的技术。同时,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成为对抗苏联的盟友,向日本开放其巨大的市场,确保了日本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4]40-41}没有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是难以想象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作用,造就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

而一些国家现代化的受挫则与国际环境的恶化直接相关。历史上,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挫败和解体主要不是因为其国内政策,转而是对外政策。威廉二世掌权后改变了俾斯麦审慎稳健的大陆政策,转而实施扩张性的、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引发这些国家的不满和反对,导致德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其结果是欧洲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形成和一战爆发,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半途而废。二战前的日本也是如此,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日本的外交总体上是成功的,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相对友好,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没有引起大国的干预。在凡尔赛和会上,日本实现了大国梦,成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与英法美等传统强国平起平坐。通过华盛顿会议,美英法等国实际上承认了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在整个二十年代,国际环境对日本发展都是有利的。但是随着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得势,日本走上以武力进行侵略和扩张的道路,招致英美等国的反对,逐渐陷入国际孤立,到了四十年代初更是与所谓的“ABCD”四国(美英中荷)全面发生战争,最终战败,国家险些灭亡。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后现代化国家的崛起比先发国家更容易引发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实施的是赶超战略,崛起的速度通常比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的先发国家快得多,从而对国际体系构成冲击。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迅速崛起会改变国际力量的平衡,在一个竞争性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极易引发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的疑虑、担心和恐惧。一般来说,实施“赶超战略”的后现代化国家通常都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通过国家权力对市场和社会的强有力干预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往往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自由市场的培育,甚至走上威权主义的道路。拥有强大国家机器而又迅速崛起的国家更不容易获得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信任,如果后发国家不能审慎和明智地处理与先发国家的关系,先发国家可能会对后发国家采取阻挠、破坏甚至遏制的政策,包括阻止先进技术和资金流向后发国家,向后发国家关闭市场,制造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从而使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无法发挥。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进行技术封锁还会拉大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甚至导致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停滞。这是因为后发国家通常是通过引进和模仿而不是自主创新来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并缺乏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仅如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会使后发国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安全而不是经济发展,甚至放弃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简言之,国际政治的变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出现挫折和中断,从而使现代化事业功亏一篑。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经济腾飞也是得益于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率先退出冷战,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的正确判断(那时冷战还没有结束),改善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关系,

系,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加入美国主导的阵营,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乃至整个外部环境。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认可和支持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利用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长达 2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功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发挥“后发优势”,包括引进技术、吸引外资、裁军以及进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取得了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

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也迅速改变了国际权力格局,引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警惕、猜忌,乃至遏制和打压。近年来中美(西)关系持续紧张,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2024 年中国人均 GDP 还只有 1.38 万美元(世界银行数据),跟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而且还没有摆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我们长袖善舞,纵横捭阖,通过审慎、明智和稳健的外交政策继续营造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避免外部环境的继续恶化,使我们的“后发优势”继续得以发挥,确保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解决国内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问题,并如期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总而言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能否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从而拥有一个稳定、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一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这是考察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得出的重要经验与深刻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7.
- [2]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Latecomers and Survivor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 [3] Chang Kyung-Sup, *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0.
- [4]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刘 浏)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The "Latecomer's Advan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ANG Li-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rol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latecomer's advantage" in modernization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Japan and German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uccess of latecomer nations in 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not only on domestic strategies but also on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pen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Post-WWII Japan leveraged the U. S. -led global order to achiev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imports and export-oriented policies, while the German Empire's modernization was derailed by geopolitical miscalculation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rived under post-Cold War globalization, yet rising Sino-U. S. tensions reveal the fragility of external condition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prudent diplomacy and maintaining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re essential for latecomer nations to sustain modernization momentum and avoid the "latecomer's disadvantage".

Key words: latecomer's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